

全球视野下的  
马新华人研究

CHINESE STUDI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GLOBAL CONTEXT

吴小安 黄子坚◎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北京大学与马来亚大学共同主办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研究:历史、文化、政治”学术工作坊的成果。全书由18篇论文组成,重点包括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马新华人商业史研究,马新国家、族群与教育发展等三个方面议题的学术探讨。本书代表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值得借鉴。

本书适合对东南亚历史与政治、海外华人社会与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视野下的马新华人研究/吴小安,黄子坚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7

ISBN 978-7-03-061916-7

I. ①全… II. ①吴… ②黄… III. ①华人-研究-马来西亚 ②华人-研究-新加坡 IV. ①D634.333.8 ②D634.33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9323号

责任编辑:王 媛 李春伶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师艳茹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7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1/2

字数:384 000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前 言

多年来，我们反复讨论如何主办一次关于马来西亚研究的国际学术工作坊。作为身处中马两国志同道合的同龄历史学人，我们原先的想法很宏伟，主要围绕马来西亚历史的主题、面向国际英文学术界展开。经过反复斟酌后，觉得还是先尝试专门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面向中国和马新地区华语圈学界入手，比较切实可行。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研究拥有长久的传统，起点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学界的“南洋研究”，即对东南亚华人社群，特别是对马新华人社会的高度关注。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中国厦门与广州等地相关高校，以及东南亚地区马来亚大学与南洋大学，相继培养了一批学者，后来也有一批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学人陆续参与进来，逐渐开拓了南洋研究的崭新议题，譬如移民、族群、身份认同、本地化、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战后华社的发展等等。当南洋研究在不断地深化与扎根时，最被关注的领域无疑仍然是马新华人，马新地区也始终是引领东南亚华人研究的最重要动力来源。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学界对马新华人也显露出浓厚的兴趣并展现了许多崭新的喜人成果。马新华人研究学术社群日益互动，逐渐凝聚，研究方法不断翻新，研究议题亦不断扩大。有鉴于此，2016年12月4—5日，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与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携手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中心主办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研究：历史、文化、政治”的学术工作坊。《全球视野下的马新华人研究》一书的出版即是在这次工作坊基础上合作的结晶。

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对工作坊经费的大力赞助，十分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陈业诗、冯昆健、车永全、印驰和丘忠盛等同学出色的会务保障服务，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为本书出版而

提供的宝贵支持。会议期间，正值何启良教授受邀在北京大学客座访问，我们感谢其对会务提供的有益建议。马来亚大学林德顺博士、拉曼大学陈爱梅博士、沙撈越\*马来西亚大学蔡静芬博士和高雄师范大学利亮时博士等学者皆应邀参会发表论文，给工作坊增色不少。虽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本书最后遗憾地没有能够收录他们的大作，但对他们的热情支持，我们心存感激。本书的出版，与科学出版社王媛编辑的倾心付出是分不开的，专此致谢。毋庸讳言，本书仍有许多值得商榷和亟待改进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

吴小安 黄子坚

2019年春

---

\* 现译作砂拉越，此为旧称。后同。——编者

# 目 录

前言 .....	吴小安 黄子坚 / i
导论 .....	吴小安 黄子坚 / 1

## 第一部分

从“华人性”到“后华人性”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札记 .....	石之瑜 李慧易 / 17
方法、地方知识、书评之必要：当前马新华人研究的几个重要 议题 .....	何启良 / 32
近百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书写刍议 .....	廖文辉 / 52
婆罗洲华人研究途径探析：在地史料、跨域议题和理论创新 .....	陈琮渊 / 69
新马印社会下的“多元”概念演变及当地华人历史处境 .....	张碧君 / 81

## 第二部分

人民行动党的族群管治策略：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华文官化事件” 与族群政治 .....	李淑飞 / 99
太平洋战争前中国跨国企业在东南亚：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发展 为例（1915—1941年） .....	庄仁杰 / 117
殖民档案视角下的二战前新柔廖华人经济网络 .....	徐晓东 / 146
富绅商与穷苦力：李季濂和高州华工 .....	陈妙恩 / 174

马新客家族群产业发展与网络创造过程·····	张翰壁 / 189
吉隆坡华人文化枢纽的形成与演变·····	吴益婷 / 204

### 第三部分

马来西亚客家人迁徙史·····	曹云华 曹雨 / 221
神庙的典藏：马来西亚客家华人的仙师爷庙考察·····	张维安 / 248
失控与控制之间：马来联邦华人新客的期望与艰辛 （1908—1910年）·····	吴龙云 / 264
华教精神：林连玉古体诗的自我形象·····	潘碧华 成茉莉 / 284
左派文人视野中的英殖历史再现 ——汉素音与《餐风饮露》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金进 / 301
论新马华文文学中的“南洋大学”书写·····	朱崇科 / 315
图像南洋与空间生产：以南洋艺术学院为例·····	薛莉清 / 340
论文集作者简介·····	367

# 导论

吴小安 黄子坚



长期以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一直是中国国家发展、现代化事业开拓与对外开放倚重的宝贵战略资源、重要管道平台、积极推力力量和密切联系的民间使者。一般而言，华侨华人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的主轴关怀运转：其一，原乡视角，与祖籍国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框架关联；其二，在地视角，与侨居国的国家与社会政治、族群和宗教的重要课题关联；其三，国际视角，与世界历史、殖民主义、冷战、全球化、国际移民和跨国主义的重要人类历史进程和主题关联。华侨华人研究，过去一直很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诸如受冷战和东南亚建国工程的深刻影响等等。华侨华人研究，后来则逐步成为一种学术关怀的方法和尺度，诸如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替代品，成为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的突出现象，成为国际移民、裔群研究、跨国主义、华人性和华语语系研究的重要样板等等。华侨华人研究，当下则一直很热闹，与一系列新形势、新发展密切相关，诸如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外经贸文化关系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密切，中国旧移民与新移民，留学归国，吸引外资（很多是华人资本）与中国资本走出去等。

就地区范围而言，三大重点板块构成引领华侨华人研究的龙头区域：其一，东南亚地区；其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其三，北美地区。三个地区，都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核心集聚地，长期分别与侨乡华南闽粤地区紧密互动，构成

第三是研究平台的建构及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认为田野工作及在地脉络（包括语言能力及学术网络的建构）的掌握，是华侨华人研究创新的重要基础，但人类学式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或在地观点的民族志书写并非创新的唯一来源。唯有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碰撞，才能提供更丰富的视野及灵感。例如国际关系与社会学看似并无交集，实则有互补。国际关系以研究整个世界为职志，但实务上是研究国家互动及区域发展的；社会学虽不直接处理国际关系，但时常涉及移民、难民、族群冲突等国际问题。<sup>①</sup>整合两者的视角及方法，将有助于华侨华人研究。

第四是从事实描述迈向理论建构。华侨华人研究至今仍存在“重历史，轻当代”“重描述，轻分析”的现象，不少研究者甚至排拒分析性概念的应用与建构。华侨华人研究要想进一步融入社会科学的主流，势必无法在抽象层次的理论建构上故步自封。远者不论，东南亚研究就为社会科学领域贡献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等重要概念，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斯科特（James Scott）等东南亚专家的经典研究，更是广受援引的分析范型。华侨华人研究的自身定位，应追求从经验研究、比较研究中凝练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或架构。<sup>②</sup>

最后，有关婆罗洲与中国的历史互动、与马来半岛的政治关系的探讨比较多，但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往来，则相对模糊，整体观的婆罗洲华人依然少见，而婆罗洲华人研究则是东南亚区域、华侨华人研究的绝佳演示，华人在婆罗洲的跨域活动，包含许多跨越/超越时代、国别、族群、政治、认同的事例，有待梳理及比较研究，这些都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

① Albert M. Buzan 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ocial Whole’: Encounters and Gaps Between IR and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13, 7, pp. 117-135.

② 陈琮渊：《台湾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发展脉络与创新路径的再思考》，载杨昊、陈琮渊主编：《台湾东南亚研究新论：图象与路向》，台北：洪叶文化，2013年，第154页。



# 新马印社会下的“多元”概念演变 及当地华人历史处境

张碧君

## 一、前言

“多元”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早于殖民时期就已开展，但作为一种概念，可追溯至 J.S. Furnivall (J.S. 弗尼瓦尔)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简称二战) 前提出。Furnivall 身兼殖民官僚与学者的身份，提出“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 的概念，意指不同的种族/族群共存于分割的地理与社会文化场域中。每个群体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思维、行事方式，只有在市场中才有机会互动，不涉及同化、融合等问题。虽然在同一个政治单位下，经济活动也依族群而有所分别。<sup>①</sup>到了现代，王赓武指出，多元主义应该在最低限度上，意指对少数民族的容忍与接受。<sup>②</sup>换句话说，不同群体共存，但有着相当程度的和平与相互理解；能商讨出共同接受的规则与解决冲突的机制，也能共同营造出社会互动、共创繁荣的局面，甚至也能互相分享政治权力。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地社会是探讨多元主义概念，与华人在

---

① Furnivall J. S.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9, p. 146.

② Wang G. W. "Continuitie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in Sundaram K. J. *Reinventing Malaysia: Reflections on its Past and Future*. Bangi: University of Malaysia Press, 2001.

其中的历史处境及生活经验的极好的案例。南洋/东南亚华人向来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华人不同，二者最主要的差异就在于，南洋华人处在殖民社会“分而治之”的族群政策下，以及南洋当地殖民社会后来兴起的民族主义将华人视为“民族-国家”历程的“外人”。分而治之政策，则是经常将华人的种族或文化差异，在有阶层的系统内视为是他者性。本研究希望从历史层面回顾多元的社会现实，多元的概念如何在这三地形成，以及多元文化的脉络如何影响了华人的生活经验，这些生活经验包括族群关系、文化、语言和认同。谈到东南亚华人认同，王赓武通过观察认为，在中国疆域之外的“华人”的身份是从文化认同而来，并且是主观性认定。<sup>①</sup>而探讨此问题，应该从“地方”（place）与“生活实践”（practice）所产生的差异来看“华人性”。在东南亚的脉络下，“华人性”的问题几乎可说是什么样的族群身份在国家认同下建构。也因此，王赓武指出，“华人性”是一个难以精确描述的问题，它牵涉认同与意义的评断。<sup>②</sup>华人于此三地的历史处境如何受“多元”概念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本文将依殖民前后与独立前后进行探讨。

## 二、殖民时期的多元现实

殖民为东南亚引进了开发人力，并因此带来了混血族群<sup>③</sup>，例如，从19世纪开始，海峡殖民地逐渐产生了“峇峇”或“海峡华人”族群，印度尼西亚群岛则有“土生华人”族群。<sup>④</sup>在爪哇岛，华人移民从未间断，但华人之间的歧异性逐渐区分出文化性强烈的华人与具有高度混杂性的华人。但荷兰殖民政策进行种族化的社会阶层，将土生华人从“当地土著”中区分出来，并把所有的

① Cushman J, Wang G W.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0-15.

② Wang G W.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Hamilton G G.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p. 118-134.

③ Skinner G W. "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Reid A.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ydney: Allen & Unwin, 1996, pp. 51-93.

④ 华人混血族群的产生，源于明清时期禁止男性携家带着往海外移民（见 Skinner 1996）。

华人置于同一个法律行政范畴之下。在爪哇的土生华人，被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是第一批“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在族群混居的城市出生，是19世纪都会地区使用马来语与惯用马来文化的最大组成分子，并因此影响了日后“印度尼西亚”国家文化的形成。<sup>①</sup>然而，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国族主义最早的起源是经过伊斯兰组织 Sarekat Islam 形成，并带有反华的色彩<sup>②</sup>；另一方面，中国的辛亥革命鼓动了部分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华人，同时清朝末年持续带来了华人移民浪潮，增加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分子的反感，导致了本土性强烈的土生华人最终未能被融合进国家认同当中。

19世纪末，在当时的马来亚与海峡殖民地，“峇峇”族群与华人移民的数量比约为1:3.5。<sup>③</sup>从中国南来的移民使广东话与客家话成为马来亚锡矿工人的主要语言，潮州人则主要在柔佛与廖内群岛从事农业，他们与使用混杂语言（福建语、马来语、英语）的“海峡华人”在文化取向上形成了对比。一种团结的跨种族反帝国运动，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产生<sup>④</sup>。例如，吴佩松从海峡殖民地时期开始探讨新加坡的华人性，并指出一项奇异的对比：当左派的林清祥在反殖运动中强调马来话/化的重要性，或者是跨文化的团结时，20世纪30年代的海峡华人精英在马来亚时期提出的多元文化主义却要求尊重华人文化，而非强迫华人同化于英人主导的马来亚认同。

马来（西）亚的多元现实在英人到来前即已存在。在贸易时代，来到马来半岛的旅者、传教士、贸易商等从各地而来，当地的族群除了马来人，还包括了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暹罗人、当地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各族移民。值得注意的是，殖民之前的社会文化相对开放，具有调适性，并容易接受“他者”。<sup>⑤</sup>这样的文化氛围在英国殖民后有所改变。事实上，统治者（苏丹）与宗教（伊斯兰）的关系被英殖民者所确立，并进一步强

① Reid A.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1, 65.

② Sarekat Islam 于1911年成立，一开始是染布商人希望团结起来与华商竞争的组织，之后演变成东印度第一个反帝国主义团体（见 Shiraishi 1997: 187-194）。

③④ Reid A.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2.

⑤ Embong A R. *State-led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alay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化<sup>①</sup>，这层关系深刻影响了之后马来穆斯林文化的呈现。这层关系的确立，更导致宗教日后在马来（西）亚公共领域的多样性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与华人、印度人竞争，马来精英把宗教信仰作为“族群”识别的方式。当马来人与穆斯林画为等号<sup>②</sup>，也就区别了非马来人与非穆斯林<sup>③</sup>，而日后伊斯兰更成为努山打拉（Nusantara）的政治性整合势力。<sup>④</sup>“多元”其实是马来半岛上的历史现实与社会现实，但当马来贵族以马来特权为诉求，而非以反殖民为首要目标时，殖民时期为控制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族群分治，在马来民族主义兴起之时，便延续深化为族群对立。也因此，当英国于1946—1948年提出建立“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时，给予华人、印度人公民权的计划，激起马来民族主义的情绪，变成谈判“马来至上”的筹码。

尽管英国和荷兰在许多殖民政策上有所类似，但两国留下的后殖民结果却相当不同。其中，当地贵族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在马来亚与东印度就呈现了不同的态势。

### 三、二战时期的抗日战争

辛亥革命前后所激发出的华人民族主义，被认为的确影响了部分当时年轻的南洋华人。例如，华人与爪哇工人在1911—1918年的合作关系变调，转变成一连串的排华冲突，而荷兰殖民官员则归咎于孙中山的革命导致当地华人追求民族尊严。<sup>⑤</sup>同时期的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关切中国未来的发展。民族意

① Hussin I. “The making of Islamic law: Local elites and colonial authority in British Malaya”, in DuBois T D.  *Casting Faiths: Imper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55-174.

② Hussin Mutalib 1990年提出，在这样的等号中，族群的排他性与伊斯兰的宗教普世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③ Hefner R W. “Introduct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in Hefner R W.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 21-22.

④ Embong A R. *State-led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alay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⑤ Reid A.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4-65.

识的提升，随着日本二战时侵略东南亚而产生了族群关系更为撕裂的结果。南洋华人的情绪主要专注于抗日，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也在日据期间经历了各样的悲惨遭遇与压迫。残暴地屠杀华人在新马印等地都有发生。<sup>①</sup>日据使华人民族主义与当地民族主义的歧见加深。因此有人认为，在马来亚去殖民过程以及印度尼西亚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华人与土著间的差异在于，当后者诉求去殖民之际，华人却专注于中国民族主义。<sup>②</sup>

战后英国重返，初期推动建立“马来亚联邦”，被视为是剥夺马来苏丹的主权。其宽松的公民权政策也危害到马来人作为马来亚主人的特殊地位，引起马来人激烈反弹。巫统的成立，把马来人的反对活动推向一个高潮，强化了马来民族的觉醒和身份认同。在英人向马来人妥协的状况下，“马来亚联邦”放弃了原计划里族群平等的精神，坚持马来亚主权属于马来苏丹、马来亚在法律上属于马来人这两个基本原则，这成为之后“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基本精神。马来人的特权地位与非马来人申请公民权的问题，在新的联合邦计划中，是一种交换与协商后的结果。<sup>③</sup>此后，马来人的优势与特殊地位，被视为是历史性的协商（historic bargain）<sup>④</sup>，更是宪法所保障的政治文化。

印、马的多元主义在战后有着截然的对比。以“族群”来区别“公民”地位，也就是土著与非土著（华人）的分化，这也曾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初被讨论过。但共和派思潮与当时处于抗殖民的危急关头，带来了包容性与非歧视性的政策结果。<sup>⑤</sup>相较于巫统，族群与宗教议题是“公民权”问题的核心，也就是区别“公民”地位的方式，并在法律上获得认可。理论上应该具有平等意涵

- 
- ① Cheah B K.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2-1945)”, in Alfred W M. *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0, pp. 75-103.
- ② Cribb R. and Brown C. *Modern Indonesia: A History Since 1945*. London: Longman, 1995.
- ③ Cheah B K. “Ethnicity in the Making of Malaysia”, in Wang G W. *Nation-Building: 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 2005.
- ④ Milner A. “Historians Writing Nations: Malaysian Contests”, in Wang G W. *Nation-Building: 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 2005.
- ⑤ Hefner R W. “Introduct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in Hefner R W.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 27.

的“公民”概念，却成为体现族群分化的结果。

此时作为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仍是马来亚的一部分，亦出现反殖、反帝的诉求。吴佩松指出，海峡华人精英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模仿左派对手来增添其反殖色彩，同一批政治精英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开始将“孔子”作为想象的中华文化/文明符号，这是具有一贯性的华化逻辑。到了 70 年代末期，“讲华语运动”与儒家文化成为“固有文化”被赋予的内容。在吴佩松看来，这是华人性受到文化性规范的开始。他以后殖民拟仿（postcolonial mimicry）的概念试图翻转新加坡政治精英的华人性论述。李光耀与其英式同僚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谋求政治资本，强调多元文化认同的方式，这类似其海峡华人前辈的做法。但对照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强调儒家文化的价值，是遗弃了先前宣称的多元文化主义，还是只是为了巩固精英领导所兴起的宣传运动？李光耀认为，政治精英们转向儒家文化，并非是遗弃了多元文化主义，而是反映了领导者采取跨文化的位置与姿态，来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主义的管理者。

#### 四、独立后的多元现实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从法律上保障了“一个国家，两种公民”。从一开始，马来西亚的多元主义就不是强调“平等地位”。1969 年发生排华暴动之后，更将原因归咎于多数族群的经济弱势，合理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新经济政策下，马来裔可以享有经济上的各种优惠及特权，包括马来裔可以优先获得商业执照和贷款，上市公司 30% 的股权必须由马来裔掌控，大学入学名额在一定比例上优先保留给马来裔，以及政府每年发出许多奖学金给马来裔学生，保送他们到国外留学等。<sup>①</sup>为了政策的执行，政府定义了何谓“土地之子”（bumiputra），进一步区别了马来人与非马来人。

印度尼西亚从 1945 年宣告独立至 1998 年发生五月暴动，新秩序时期结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政权几经更迭，执政者对当地华侨华人的态度虽有所反复与不同，但总体而言仍趋于限制与排斥。独立之初，

<sup>①</sup> Tan E K B. “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 Managing the Ethnic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01, 24 (6): 949-978.

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人口分为“本土”“非本土”族群，华人属于后者。<sup>①</sup>苏加诺时期在革命的旗帜下，打出克服旧有殖民规范的承诺。但革命时期的暴力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呈现出零星的反华暴动，并在 1965—1966 年达到恐惧不信任的程度。这个时期的政府一方面承受驱荷的压力，另一方面将国族主义运动转为妖魔化资本主义，因此在 1958—1966 年反华情绪高涨时，也是经济势力最被突显之时。<sup>②</sup>同时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的几部国籍法，以及各项条令涵盖了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这从法律上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生存和发展环境施加了压力。<sup>③</sup>

苏哈托时期翻转前朝意识形态，鼓励经济自由化，也拉拢成功的印度尼西亚华裔，但对华人的负面观感仍持续发酵，更是以种种名目条令剥夺印度尼西亚华人作为国家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苏哈托对华人的态度有两个层次：文化上的与经济上的。一方面，在文化上采用全面同化的政策，禁止华校、华文媒体与华人社团。另一方面，鼓励经济开放，容忍华人的经济活动，甚至对华人的经济活动给予特权，但严格限制华人涉足政治领域。即便华人在当地已有长久居住生活的历史，也参与了不少国家的重要的关键历史时刻，并对国家经济与发展有所贡献，但他们在政治操作下仍被赋予了外来性，并始终挥之不去。华人在后苏哈托时代则经历了文化复苏的阶段<sup>④</sup>，但新秩序时期进行的同化政策，却让那一代华人有着世代性的失落。<sup>⑤</sup>

在历经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反华暴动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个主要大城市爆发。与过去的反华暴力不同，此次除了劫掠、杀害、放火，还发生了华人妇

① Suryadinata L. “Chinese Indonesian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some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 Suryadinata L.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 12.

② Reid A.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urdey J.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199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禁止华人进行进出口贸易，这也导致雇用土著作为门面的“阿里巴巴”经济形态出现。1959 年的总统法令禁止华人在乡村从事零售业，也导致华人多聚居于城镇（见 Suryadinata 2008）。

④ Kusno A. “Remembering/Forgetting the May Riots: Architecture,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Cultures’ in Post-1998 Jakarta”, *Public Culture*, 2003, 15 (1): 149-177.

⑤ 例如 FX Harsono 以书写自己华文名字，但不断被雨水冲刷掉的展览，表达对寻不回的根的失落感（见 Smith 2015）。

女受暴情形。1998年的五月暴动被认为是政治性的驱动，转移群众对苏哈托长期执政的不满。<sup>①</sup>印、马两国分别在不同时期发生“五一三”排华暴动，前者发生于1998年，后者发生在1969年。两者虽相隔近三十年，但种族冲突的焦点都着重于华人在经济领域的强势。虽然少数具有经济掌控能力的华人企业是被憎恨的对象，但小人物也在街上公开地受害，甚至妇女也成了攻击目标。Reid在归纳中指出：两个五一三事件都带来了长期性的影响，但对当地华人的影响不同，其中暴力运作的政治也有所不同。在印度尼西亚1998年的五月暴动中，暴力并非争夺权力的武器，但于1969年的马来西亚却是。印度尼西亚的暴动间接导致了苏哈托下台，同时也带来了民主转型的契机，马来西亚则以法律压制华人权益。<sup>②</sup>五一三事件在马国仍是禁忌话题；在印度尼西亚，也未等到来自官方的追究与调查，政府对追求真相的冷漠态度仍是华人恐惧与不信任的来源。

新加坡在与马来西亚联邦合并初期，人民行动党提出了马来西亚认同不等于马来文化的挑战，并以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的4Ms模式：多元种族（multiracialism）、多元语言（multilingualism）、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多元宗教（multireligiosity），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但新加坡于1965年被马来西亚逐出联邦，造成在意外事件中独立。换言之，当时尚未独立的新加坡认同，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直到1965年建国之后，新加坡才出现“新加坡人的新加坡”（Singaporean Singapore），并以4Ms模式作为国族建构基础。政府在独立之初就决定了多元政策有其历史脉络，因为英语群华人与华语群华人在反殖民时期并无语言与文化上的联结，最后英语群华人诉诸多元文化主义，以此意识形态来应付当时的华人沙文主义与马来民族主义。因为这样的历史结构，国族建构从一开始便强调的是“现在”与“未来”，“过去”则被视为国家前进的障碍。<sup>③</sup>

① Suryadinata L. “Chinese Indonesian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Some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 Suryadinata L.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 1-16.

② Reid A.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5-76.

③ Lau A. “Nation-Building and the Singapore Story: Som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Singapore History”, in Wang G W. *Nation Building: 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 2005, pp. 221-250.



建国历史的短暂，几乎等同于没有光荣辉煌过去可供凝聚，也因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建国初期不愿强调多元性，认为多元性强化了族群/文化认同，将不利于凝聚国家认同。Ban, Pakir and Tong 指出：殖民统治抹去了新加坡历史的特性，时时提醒新加坡应附属于更大的单位。例如，附属于东印度公司、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西亚联邦或马来西亚。殖民历史使得人们关于新加坡的想象是破裂的、去疆域化的，而附属于不同的行政单位，则阻碍了国族历史的形成。作为曾经被殖民的对象，显示新加坡作为国家的独特想象，应始于独立建国。<sup>①</sup>

在新加坡多元模式下的华人性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5年到1979年，为了提倡“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认同，而产生去华人性的官方基调；第二阶段是1979年到1990年，是提升华人性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90年至今，是积极宣扬华人性的阶段。<sup>②</sup>第三阶段的国族建构，需要光荣的历史、传统、神话与国家英雄。而此阶段的意图，导致新加坡的历史系谱与中华文明，甚至与中华民族主义产生了联结。例如，政府对孙中山及其在新加坡时的居所晚晴园进行重新调整定位，目标在于形塑一个深受辛亥革命影响的新加坡国族主义。陈庆文认为，这显示了官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重新强调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社会的核心地位。但受“孙中山”激励的新加坡国族主义有其历史断裂，例如在抗战时期为保卫新加坡而牺牲的林谋盛（Lim Bo Seng）与阿德南（Adnan Saidi），就未获得应有的国家英雄的待遇。

多位当地学者认为，新加坡认同是由新加坡的成功故事（Singapore Story）所定义<sup>③</sup>，而新加坡成功故事的主轴即为物质性生活条件的改善与经济的成绩。相对地，经济发展也就成了认同的要素。循着实用主义逻辑，对新加坡而言，经济领域比之教育领域，更是一个强调“华人性”的平台。但同时，因中新的商业往来而产生的“苏州工业园区”与“无锡新加坡工业园”例子证

① Ban K C, Pakir A. and Tong C K. *Imagining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3.

② Tan E.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The China Quarterly*, 2003, 175, pp. 751-774.

③ Chua B H. “Culture, Multiraci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in Chen K H.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b.

明，虽然同是华人，但文化上的亲近性却并非理所当然。<sup>①</sup>Terence Chong 2010年认为，多元政策是新加坡官方表达新加坡故事的一种叙述方式，用以说明新加坡在意识形态上的成功。他指出，当外在环境改变时，用以控制与动员的意识形态也将随之改变。“国家”“国族主义”“国家认同”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成为不断变化中的概念。人民行动党向来主导这些概念的内容与意义。生存危机与经济发展是一切国家发展的基本原则，“国家认同”也不例外。

当谈论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处境时，应从官方制订的多元种族政策（multiracialism）来看。当今世界各国，几乎没有国家不是多族群，但少有国家采用多元文化主义。新加坡作为意识形态与官方政策的多元种族主义，并非由社会现实所驱动。新加坡的“多元”政策设定了四大族群（CMIO: Chinese, Malays, Indians, Others）框架。蔡明发（Chua Beng Huat）历来所批评的，“种族”（race）在新加坡是一显性的范畴，而且每一“种族”都被本质化并简化地建构。每个族群范畴都把族群内部的各种差异单一化了。<sup>②</sup>他进一步指出，华人族群被华语（语言）所定义；马来族群被伊斯兰（宗教）所定义；而所有来自南亚不同地区的人都被归类在“印度人”之下，被“地理”所定义。这是因为“种族”与“文化”被惯常性地画上等号，从母语政策、宗教节日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新加坡华人使用方言的文化复杂性被“华语”单一化了此一族群范畴。也因为“种族”等于“文化”，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被特别彰显，但讽刺的是，它沿用了英殖时期对种族的区分方式。另一个讽刺则是，多元文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同时，每个族群却都害怕自己的文化消失，这股忧虑在“种族”等于“文化”的意识形态下，带来了更保守的“文化”版本。<sup>③</sup>

在新加坡，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华人性”？根据柯思仁的分析，“华人性”可以是一种集体意识，也可以是个人经验。<sup>④</sup>他认为，战后新加坡华

① Tan E K B. “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 Managing the Ethnic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01, 24 (6): 949-978.

② Chua B H. “Racial Singaporeans: absence after the hyphen”, in Kahn J. *Southeast Asian Identities: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and Thai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a, pp. 28-50.

③ 例如，蔡明发认为，新加坡华人对儒家的认识经常局限在家庭孝道观念。

④ Quah S R. “Performing Chineseness in multicultural Singapore: a discussion on selected literary and cultural texts”, *Asian Ethnicity*, 2009, 10 (3), pp. 225-238.

人如何看待“华人性”，有着世代间的差异。20世纪50年代的华人最拥抱“在地”文化，而“在地”指的是历史、地理与政治概念上的“马来亚”。在反殖民与独立的思潮下，有些华语群华人关切的是建立多元文化的马来亚国家。20世纪60年代则被科思仁视为是“华人性”的分期，意即60年代与之后出生的人，在多元种族/文化的环境下成长，并经历国族建构阶段，因此对“华人性”的理解有别于60年代之前的人。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因为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地位，华语群华人感到失落，并忧心华语与华人文化的失落。但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面对中国在各方面的崛起，以及来自中国的大量的华人移民，“华人性”在新的处境下被重新思考。<sup>①</sup>因此，新加坡华人的认同一方面是在独立且多元的國家的基础下产生，另一方面，“华人性”的定义却必须以中国为参照点。

英殖时期治理种族的“分而治之”政策，在新加坡独立后对国内族群采取的措施中看到遗绪。只是政府对于多元文化主义、多元种族主义的操作，已然规范了华人该是什么样的华人。蔡明发指出，新加坡式的“多元种族主义”逻辑，强调在种族平等的机制上运作。但除了学校内的“保护母语”课程之外，各种族/文化则由各群体自行负责，政府提供一视同仁的行政支持，不能在种族的基础上有偏袒的作为或政策。以上论述与西方相比，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重点在于给予少数族群更多的资源与支持，以弥补或修正过去曾遭受的不公义（当地用语，“公正”的意思，后同）对待。但在新加坡，为了不动摇种族平等的基础，各种族都无法以各自群体的需要来表达诉求。多元主义造成的结果不是“赋权”（empowerment），而是相反。然而，官方性论述却也一向认定。在一项以《海峡时报》报道为文本的内容分析指出，多元文化的和谐与否其实敏感脆弱，非自然而然形成，从某些角度来看，合理化了政府的介入。同时，族群认同与特色依旧“没有变化”，这反映了官方以本质主义理解族群文化的常态。<sup>②</sup>这项研究呼应了先前文献的观察。<sup>③</sup>

① Quah S R. “Performing Chineseness in Multicultural Singapore: A Discussion on Selected Literary and Cultural Texts”, *Asian Ethnicity*, 2009, 10 (3), pp. 225-238.

② Holman J, Arunachalam D. “Representing Harmony and Diversity: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Ethnicity in Singapore”, *Asian Ethnicity*, 2015, 16 (4), pp. 498-515.

③ Chua B H. “Culture, Multiraci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in Chen K H.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五、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崛起对新马印华人之影响

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印度尼西亚逐渐民主化，对华人的态度更加开放。除了2006年的公民法废除了本土与非本土的区分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指标，华人社团/政党、华文媒体、华文教育等也开始复苏。<sup>①</sup>有人认为这是出于政府对于反华暴动的补偿心理<sup>②</sup>，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崛起的经济力量不可忽视，而印度尼西亚政府体认到国内的经济情况若要改善，必须要有华人的积极参与。<sup>③</sup>换句话说，印度尼西亚华人在语言、节庆、文化，乃至至于社团、媒体等复兴，受惠于东亚区域经济格局的改变。虽然加在印度尼西亚华人身上的诸多禁令，在后苏哈托时代一一解除。但印度尼西亚华人面临的是“重新”学习华人的习俗与节庆，甚至语言。在Reid (Anthony Reid, 安东尼·瑞德) 看来，是一种再华化 (re-sinification) 的表征。<sup>④</sup>

金融危机前的马来西亚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近二十年，金融危机后，时任总理马哈迪提出建构“马来西亚国族” (bangsa Malaysia) 的论述，其中隐含族群平等的意涵，并伴随着国家从制造业转型为“知识经济”的愿景。虽然尚未达到马哈迪提出的“二〇二〇宏愿”的时间点，但目前却也看不出族群关系往前迈进的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来族群内部的分裂，争论关于国家是否应该更伊斯兰化，也关于是否应该让华人参与更多的国家计划。当今马来西亚的宗教已相当具有政治性，族群关系是否和谐已无法超越宗教因素。但也寄望因为“新经济政策”而出现的马来中产阶级，能因为更有自信而对族群关

① Suryadinata L. “Chinese Indonesian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Some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 Suryadinata L.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 1-16.

② Kusno A. “Remembering/Forgetting the May Riots: Architecture,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Cultures’ in Post-1998 Jakarta”, *Public Culture*, 2003, 15 (1): 149-177.

③ Lembong E. “Indonesia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Ethnic Chinese: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uryadinata L.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 48-56.

④ Reid A.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系有新思维。<sup>①</sup>

“华人性”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在“生存危机”的意识形态下，被认为是国家主义的障碍。但如今随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情势的提升，新加坡开始有信心地提升华人认同。在经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以新自由主义的原则重塑“华人性”。新自由主义下的华人性在官方主导下呈现去历史性，以及更具功能性的倾向。为了更趋近中国市场，西化的新加坡华人可以以中国与西方的桥梁自居，以会说“华语”作为一种个人专业技能，而不仅仅是群体性的社会特质，政府所构想的华人性越发地新自由主义化。以“门户”（gateway）作为比喻，不仅表明了年轻精英具备横跨中西文明的能力，也具有整合资源、资金与人流的优势。因此，除了每年都推出的“讲华语运动”，当局更从2000年起推出扫除新式英语（Singlish）的“讲标准英语运动”（Speak Good English Campaign）。华人的多元经验不及打造能扮演“桥梁”或“门户”的精英重要。虽然学习英语是功能性大于文化性，不过以语言与文化来彰显的华人性，与英语一样，是可被教导的。

## 六、结论：对多元的反思

虽然曾经与马来亚命运相连，但新加坡的政治与文化样貌却与马来西亚相当不同，与印度尼西亚更是相差甚远。新加坡的华人是主要群体，且没有任何宗教可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新加坡不像印、马两国有着根本性的分裂，会威胁到公共参与或治理，但从学者的关切可以看到民间社会对跨文化对话的渴望。新加坡华人的“华人性”一定要在多元文化的脉络下，才能被观察与理解。换句话说，“华人性”如何被展演、统整，或如何抗拒，都与其语言、文化，或族裔产生关系。<sup>②</sup>而印、马两国“土著”均是优势族群，且优势族群又多同时具有穆斯林的宗教身份。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不提倡多元族群的国家主义，而是马来族国（Bangsa Melayu）的概念。马来西亚华人在对立中求生存，

① Embong A R. *State-led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alay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② Quah S R. “Performing Chineseness in multicultural Singapore: a discussion on selected literary and cultural texts”, *Asian Ethnicity*, 2009, 10 (3), pp. 225-238.

在政治领域之外，力求文化与语言的传承，因此更强调历史与教育。印度尼西亚是群岛国家的形态，“多元”是无可避免的现实。与马来西亚不同，印度尼西亚以具有包容性的公民概念与共和精神的宪法立国，但可惜的是，政治上的实践达不到建国意识形态中设定的理想。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口不到2%<sup>①</sup>，其语言与文化均非常本土，但始终被贴上“外来”企业家形象，并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以“建国五原则”（Pancasila）确立了保障多元的原则，但华人总是原则的例外。在国家理想的架构下，多元主义可避免放大特定族群的优势。都会区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却经常被排除在国家赞扬的多元性之外，而这需要民主的氛围与素养，来消除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外来者”身份。另一方面，如何让“土生华人”这个族群脱离华人的意涵。在东南亚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至今仍成为一族群范畴，原因并非在于其群体的文化特质，而是因为其在经济、商业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该角色被主流群体所赋予的外来性。即使是经过苏哈托的同化政策，印度尼西亚华人再次经历了19世纪的经验，亦即，是印度尼西亚族群里最印度尼西亚化的群体。<sup>②</sup>

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常被相提并论，在于这两者有着类似的历史经验。两者都是政治上的“他者”，为了“土地之子/土著”作为想象共同体而必须存在。<sup>③</sup>首先，华人在印、马不被视为“土地之子”，而是被加上“外来者”的角色。其次，华人在两国的经济领域具有实力却遭受排挤，这是社会“不正义”的体现。即便华人已成为事实上的公民，此种论述仍然存在，这显示了华人在共同体的情感想象层面并不被视为我群的一部分。在印、马，“族群”议题是一种动员优势族群的手段，其他如阶级、文化、宗教等因素，是用来深化族群议题的嫌隙。<sup>④</sup>种族/族群作为分类的范畴，在新、马两国是显性的，并以此作为多元文化发展的依据。在新加坡，这样的分类方式在文献的反

① 依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印度尼西亚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1.2%左右。这份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在于：这是自1930年以来首次以自我辨认所属族群的方式所进行的人口普查。2010年又进行的人口普查以2000年的数据为基础，其中华人比例已略低于1.2%。见 Evi Nurvidya Arifin et al. (2016)。“Chinese Indonesians: How Many, Who and Where?” *Asian Ethnicity* v.18, no.3, pp.310-329.

② Reid A. *Imperial A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Tan E K B. “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 Managing the Ethnic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01, 24 (6): 949-978.

④ Ibid.: 952.

思中，被视为是对多元的限制。在执政者的主导下，多元华人性反而向着单一华人性发展。马来西亚承袭了殖民知识框架，宗教与族群是公民的分类方式。印度尼西亚摆脱了殖民者的分类方式，种族概念相对隐形。为了国族建构，印度尼西亚强调多元价值，但华人始终被视为“外来者”的角色，是多元的例外。在历史因素下，印度尼西亚华人内部极其多元，不具有华人性的“土生华人”在殖民时期被放进“华人”范畴，在后苏哈托时期，政治性需要复兴华人文化之际也是如此。

虽然从历史考据可以得知华人生活在东南亚岛屿已超过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多元族群”的概念与现实，却可以说是西方殖民下的产物。<sup>①</sup>华人作为“外来者”从殖民前即已存在，但殖民者升高族群对立的情势，僵化族群分类，以强化社会阶层的界限。对殖民者而言，通婚、混杂、同化不利于社会阶层形成。因此，若要在后殖民的脉络下谈论新、马、印的华人与“华人性”，就需要回溯殖民知识框架。

“多元”是历史、政治，也是文化遗产，是前现代时期就存在的事实，到了殖民时期，多元现实成为族群分而治之的对立型框架。二战时期，族群分治的框架被继续沿用，对立的情势则继续升高。独立建国后，乃至当代，多元的差异经常是族群混合宗教，成为动员群体或撕裂社会的因素。回头看 Furnivall 的理论，它固然过于简化，讽刺的是，经过反殖民族主义洗礼的现代社会却表现出对“多元”的担忧、惧怕与限制。Reid 指出，这在于现代政治倾向于将“种族”视为是科学范畴，而“国家”则与情感范畴有关。<sup>②</sup>然而，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对这些范畴的特别关注，其实也是种特意的人为建构。时至今日，“多元”现实更为复杂，但对于“多元”的尊重、理解与包容却没有日益增长。新、马、印三国有着不尽相同的多元历史，华人在其中的生活也有所不同，然而相同的是，跨族群的和谐有赖于跨越文化障碍。文化/文明间的异同需要被理解，期待有一天，对话与知识可以代替假设与偏见。

---

① Hefner R W. "Introduct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in Hefner R W.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 4.

② Reid A.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86.